

■ 高 承 恕

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專業領域為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社會學理論、台灣社會與經濟研究。  
代表著作有《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  
《理性化與資本主義》等中、英文著作。







「這個社會太吵雜了，我們應該多注意那些沒有聲音（silent）的地方，」高承恕說的是「對社會存在著一種疏離態度的年輕世代。」

高承恕說，他執教三十年，每年都會教大一新生，就是希望一直保持著對年輕人有一分關懷和了解；他認為，一個社會必須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的希望；高承恕說，很多人說年輕人冷漠，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大人說的事情跟他實際會遇到的人生狀況不相干，久而久之，他們就選擇用「懶得理你」的態度來面對。

高承恕說，台灣以一個沒有資源的小島，為什麼過去能夠創造令人敬佩和羨慕的「經濟奇蹟」，靠的就是人才，而人才是從教育來，高承恕的觀察是，「這些年，台灣社會經常在做的都是虛妄的事情，以教育來說，實際放在教育上的資源的確是變少了，年輕人能接收到福利是減少的，」年輕人畢了業找不到工作，或者即使找到了工作，薪水也少到連養自己都很難，何況是成家育子？高承恕認為，一個社會不能給年輕人希望、熱情，這是很危險的，因為看不到未來。台灣有這個趨勢，必須注意。

自謙不敢說自己是知識分子，只以一個「教書人」、「讀書人」定義自己的高承恕說，其實，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西方的，在中國，「傳統上，『士』總是跟著『大夫』一起被認知的，一個人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士與政治基本是不勾脫的。」但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則是不從政的，就像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ymond Aron）說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事



務，充其量只能做一個「入戲的觀眾」，與政治勢力保持距離，「這樣才能具批判性，說的話也才能夠有一定的分量」。

目前台灣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定義與其在社會上應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是比較接近西方方式的，然而，高承恕認為，或許大家要思考的是，台灣究竟有沒有讓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成熟、發揮影響力的環境呢？如果要知識分子要擁有這樣的社會影響力，高承恕的建議是，知識分子第一要回到自己的專業，在自己的本分上表達意見比較妥當；第二，即使有機會在大格局裡發聲，還是要注意專業的分際，「要讓人們尊重你，就不要想通吃，那是一種『知識的傲慢』」。

其二，現代的資訊發達了，知識分子應該要與時俱進，要能經得起時代的挑戰，知道這個社會到底需要的是什麼；第四，高承恕說，知識分子要常常跟年輕時代對話，現代年輕人安靜不作聲，有時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唬爛的大人很好笑」，有時是因為他們心裡不平，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實際是比過去更困難的，很需要更多幫助；知識分子很多在學界，能在這方面多使力就多使一點力吧。

高承恕說，他對台灣社會仍然充滿盼望，「現在需要的是，有更多人願意一起把這個社會的溫度再找回來，不要冷下去了。」而像「公與義——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樣的座談會，就是一場找回溫度的聚會，看到老朋友，心也被激勵了起來；高承恕說，人生不該是用「拗」的，應該「使出勁兒來過日子。」

# 收錨、揚帆

——高承恕

## 二

十年前，我和一群研究生一起開始做有關中小企業的田野調查。那時候的台灣，從北到南，不論鄉間或城市都是生氣蓬勃、一片榮景。記憶裡的彰化和美，有四百多家大大小小的紡織廠。到嘉義的信孚企業吃尾牙，眼見一家製造千斤頂的公司也能席開一百多桌的盛況，更見識到酒量不好，做老闆的不易。八〇年代後期，台灣仍然是世界上許多消費性產品的生產龍頭。

然而，也在八〇年代後期的訪談之中，警訊隱約浮現。新台幣快速升值，新興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大量投入市場，加上歐美地區平價大賣場的削價競爭，台灣廠商的毛利愈來愈低，接單愈來愈難，外國買主的支配性壓力也就愈趨沉重。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已然悄悄轉動，當世界銀行在一九九三年出版東亞奇蹟(The East Asian Miracle)一書的時候，其實台灣經濟奇蹟已近黃昏。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解體，冷戰時期走入歷史。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春雷已響，山雨將至。在歐美買主強勢支配下，台灣外銷的廠商不得不選擇西進或南下，找尋新的代工生產製造基地，已是企業謀求生存發展的必要策略。從九〇年代開始，半個世紀以來空前未有的社會移動迅速發生，企業在移動，錢在移動，而企業主也被迫跟著移動，這些人曾經是過去幾十年台灣社會經濟的中堅，這是集體命運，也是總的趨勢。

變遷創造了機會，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總的來說，存在著三種相互糾纏的矛盾。第一是個體利益與總體利益間的矛盾，雖然，這兩者之間本來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這二十年來，不論是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個別企業與總體經濟之間的矛盾不斷地擴大。個人與政黨為了勝選，不擇手段，甚至不惜撕裂社會。企業為了個別的生存，往往也把自身的利益當作唯一的考量判準。在惡性競爭之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整體社會，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大眾，他們弄不清楚，也無能為力。

第二是政治與經濟間的矛盾。南韓北韓不是統一國家，政治軍事也有緊張對立，但它們在經貿上沒有綿密的互動。從九〇年代起，兩岸透過第三地的接連，經濟產生空前的互賴關係，而且持續擴大，不可逆轉，但在政治上則是逆向發展，緊張性與不確定性不曾減緩。二〇〇八年總統大選，不論哪一黨勝出，對立已然深化，短期之內，鬥爭恐

怕不易歇息。政治與經濟的演變反向而行，其中的內耗與傷害正不斷消耗多年來全民累積的能量。

第三是社會階層的分化日益嚴重。各種資源與機會的分配愈來愈不平衡，不公正。只問顏色，不問能力；只憑關係，不守規則。試問今天年輕人有多少真正中小企業創業的機會？除非第一代留下一些基業，否則想要白手成家是難上加難。回頭看看，台灣過去幾十年最可貴的不正是造就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家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出人頭地嗎？但我們都十分了解，社會若要維持一定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是規範的公平性與正當性，這最基本的要素一旦被破壞，形成的不是發展，而是斷裂。

在這些矛盾交互作用下，這十年台灣剛好面對的是一個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重組的大變化。挑戰本來就不可避免，但我們的回應卻顯得遲緩無力。

我們的未來呢？情勢嚴峻，除了努力調整，找新出路之外，實無他途。然而，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又悄悄浮現，那就是我們的下一代。從年齡層來看，今天十五到二十五歲的青少年，十年後將近入社會，他們的未來正是社會的未來。這些孩子在八〇年代之後出生，那時候台灣正是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這一代生於安逸。大多數沒有絕對貧窮與動亂的威脅，在整個社會化的成長過程中，外在壓力不大，在物質條件相對充沛的情況下，他們跟外部世界的接觸更加多元、開放，對於新觀念、新產品、新流行的接



受與反應遠比上一個世代更要敏捷。但弔詭的是，正是因應樣式繁多，速度太快，他們對於新產品的興趣遠超過這些產品背後所蘊涵的文化，喜歡日本的漫畫，卻對日本文化一無所知；喜歡韓國偶像演員，卻弄不懂高麗、新羅與百濟。對於多采多姿的生活嚮往遠勝過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試問今天還有多少年輕朋友每天看報紙？政治的紛擾及虛偽讓他們選擇以一種冷漠與嘲諷的態度來對待。當他們看到國家元首常常在罵人，上一任總統經常在憤怒，除了覺得好笑之外，他們已經不再願意關心。面對畢業之後工作的困難，薪資的低迷，「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已然是我們老一輩的神話。

然而，孩子都是可以教的。至少，我們可以讓他們體認到危機意識；至少，我們可以盡量給他們更多的學習的機會。九把刀文章裡的嘲弄有他的深意，蘇打綠的歌裡依然有深情。給他們機會，讓他們發揮，就會有一個新的世界。或許，此刻我們更該深思的，是如何讓他們透過學習，擁有更寬的視野、更高的格局、更深邃的心靈。